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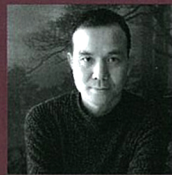
设计家

DESIGNER & DESIGNING / 2009年01月出版

上海《设计家》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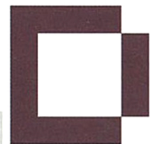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RMB 30.00元



危机 契机 Asian Designers 亚洲设计师

“生态智慧”上的建筑人生
追问生活、博爱生活的建筑师
创新传统，让建筑与人和自然相遇
多重文化经验下的“无界”设计师
多维汲取 协调融合
“我已经成为曼谷的一部分”
一个中生代广州设计师的心路历程
我的师姐顾月华
想象里的伦敦·眼里的伦敦·建筑里的伦敦



MULTI-CULTURE DESIGNING WITH NO BOUNDARY

多重文化经验下的“无界”设计师

——访新加坡陈家毅建筑师事务所负责人 陈家毅

采访：《设计家》 整理：赵夏榕

新加坡建筑师陈家毅学成于本地和伦敦，在英国驻留二十余年，他在新加坡、伦敦、伊斯坦布尔同时执业，三地正好一个位于亚洲、一个位于欧洲，而伊城，恰恰落在欧亚之间。他从小深爱华文文学，又恋慕电影艺术，他在伦敦AA（建筑联盟）接受前卫建筑之理念与实践，具有多重、复合的文化经

验。在东西方文化相互观照的交叠状态中，他取法电影、文学等，力求让每一个设计都具备新思路。而对于华文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关注与表达，则让他保持着一种对创作艺术“越界”，或者说“无界”的心态。对世界敞开，又认真体察，形成自己的判断。

01-06 Singapore Botanical Gardens, Singapore



01

陈家毅

1984年 毕业于伦敦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AA)

1984年-1990年 任职于伦敦Arup Associ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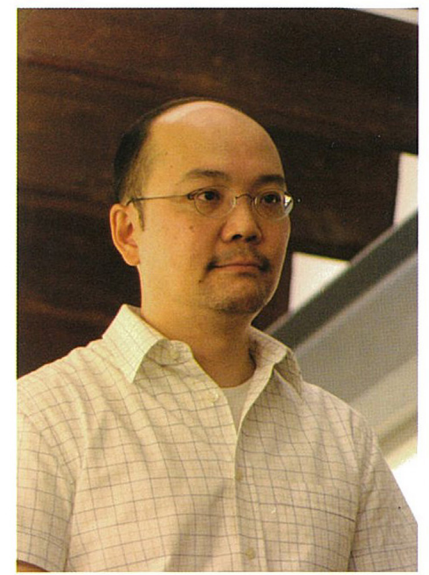
1990年-1993年 任教于伦敦大学Bar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1990年至今 分别于伦敦、新加坡、伊斯坦布尔设立陈家毅建筑师事务所

1998年至今 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

2008年 委任为新加坡佛教文物馆建筑师

出版过《重顾草莓地》、《城市磁场》等文集。有多项获奖经历，包括1985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学院RIBA《国际学生竞图》首奖，1987获“英皇家艺术学院”之“年轻设计师奖”，2000获新加坡管理大学建筑竞图首奖（KNTA Architects + Edward Cullinan Architects），2002《长城脚下的公社》北京住宅设计 获威尼斯双年展银狮奖，2007获新加坡总统设计奖——2007年度设计奖等。



建筑路上，也曾“心有旁骛”

《设计家》：请谈谈您的家庭背景。您如何获得优秀的华文学养？是更多地来自学校教育还是家庭熏陶？您青少年时代喜欢读哪些华文书？这对您日后的成长有怎样的影响？

陈家毅：在我们念书的1960年代，新加坡的教育主要分为华校与英校制。我念的是当年参考了台湾学校的华校课本，还以繁体字教学，而且溯源至诗经古文；从唐诗宋词、屈原、韩愈到归有光，白话文又有朱自清、许地山、冰心等。由于新加坡也引进中国的书籍，所以当年推崇的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等的作品都属必读本。小时课外书看得很杂，港台的流行小说，武侠小说，因为普及，随兴都会翻翻，中文底子便是这么百川纳海般，却也没真正一个系统地建立起来的。

当年念的学校附近有条中文书店街，每家店的书源书种都稍为不同，是我们放学后流连忘返的去处，有点像现在学生下课后爱逛7/11便利店。

当年星马（即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有好几份文艺杂志，高中时期我先开始在马来西亚素质比较高的文艺刊物的《学生周报》与《蕉风》写些散文、短篇小说等，也同时在一两份本地日报的副刊投稿；当时虽然还在念书，稿又倒是写得很勤密，几乎每周都有一两篇被刊登，后来这些十七八岁写的文章都收集在《不完夏》一书里，还是《学报》为我出版的。

起初文章被登在报上虽有某种“飘飘然”之感，但后来发觉作品最重要的还是要“言之有物”。由此通过写作，学习到对自己的作品懂得要有“真诚”的态度。我想这一个写作的过程令我

了解到如何经过“书写”，将“概念”、“想法”、“感情”带出来。后来又发现更高一筹的“不写之写”，便更加乐此不疲了。

《设计家》：从当初想学电影，到遵父嘱改学建筑，您后悔过吗？如果今天您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您会怎样选？

陈家毅：因为从小随着母亲看电影，下课后女佣为避开外头炽热的太阳，常把我带进戏院享受冷气，让我几乎成了个“小影痴”，对港台电影和演员如数家珍，青年时代同现在的写作者迈克·吴韦才一班人在不同的艺文园地写电影，1970年代遇上法国新浪潮意大利写实主义电影更是疯狂迷恋上电影；选择建筑倒是其次的选择，因为父亲希望我读一门“正经”学科；直到后来因为遇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在那里来来去去花了十年的时间搞清楚来龙去脉后才恍然大悟：建筑塑造的，正是电影中时光流逝捕捉进镜头里，一个又一个充满光与影的空间。

明白了之后，如今我将设计建筑过程当是故事中的场景来安排，气氛也因此更浓郁，而且每个个案有它自己的“本事”。

《设计家》：谈谈您在新加坡接受建筑教育的情况。比较您后来在英国的学习，能否比较一下两国文化差异在建筑教育上的反映？您个人是否也经历了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思考？

陈家毅：新加坡国大建筑系三年的教育像在练基本功，扎实却缺乏想象力。英国建筑联盟(AA)正好相反，这地方假设学生的基本功都齐备，就不 唆教你如何砌砖建墙之类的“普通建筑常识”。它的教学法的确前卫，将“建筑”和“艺术”的距离拉近，百花齐放，各种试验性的作品都有，而且每个门派都很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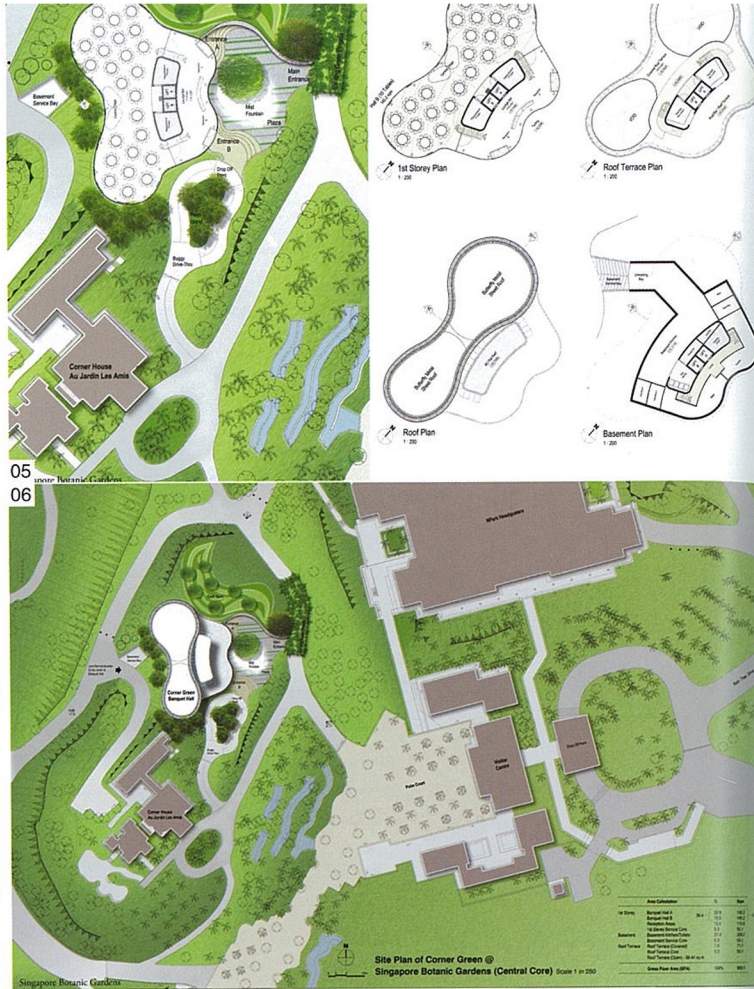
02



03



04



05

06

创性，突破前所未有的设计范围；当年AA许多的作品到今天还在被人拿来抄，一点不过时。可见它当年多先进。

《设计家》：结合在伦敦大学的教学经历，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教学思想和实践？

陈家毅：伦大的Bartlett 建筑学校原本是间比较保守的学府，学生异常优秀，因为AA学费不菲令得许多英国学生却步，伦大便成了“其次之选”。1990年代AA导师Peter Cook 与 Christine Hawley 受邀到伦大做番改革，我们年轻的一辈设计师以“降落伞队”方式空降去打游击战的，将伦大老一套的教学连根拔起，将它彻头彻尾的改过来，因为当年大部分进去教设计的，都是AA 过来的人。

那三年的教学，使我遇见了许多极其聪慧、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我对“建筑语言”极感兴趣，便鼓励学生通过作品的创作，去追寻最起源的一点，从而发展出一套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筑语言来设计创作。

《设计家》：您在伦敦度过了很长时间，从在AA的学习阶段，到后来的实际工作。这些经历，以及伦敦这座城市的文化对您后来做设计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家毅：伦敦恐怕是当今最富创意的现代城市。原因主要是它不单门户大开百花齐放，而且像磁铁一般，不断吸引了来从事与创意有关行业的年轻人。他们也许是建筑设计师，也许是唱片技师、作家、艺术家、或服装设计师、杂志创办人，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这群志趣相投又充满抱负不同国界的年轻人将伦敦这

一个城市带出并提升至一种“亢奋”的境界。

创意原本就难以归定界限，跨界而互相影响在伦敦的情况就更多。许多时候一个新的设计未必概念源自设计本身，概念从周围的新事物影响而发出产生的。

《设计家》：在建筑师、教师、作家等身份中，您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陈家毅：我想建筑师与作家都好，因为两者都富有创意/创作的成分，而且思路相通，虽然一样搞的是立体，另一样虽说是文字但其间想象的空间却无比辽阔，没有止境。教师的工作里也可以推动创作，但引导和教育的成分也不可或缺，这样的工作，年过一年教导不同的学生的过程中，便流于重复，是我比较不习惯的。

三地执业，每一个设计都作个别处理

《设计家》：请和我们谈谈您的建筑事务所。最早创立于何时何地？基于何种考虑？寄予何种期望？

陈家毅：1985年在伦敦AA建筑学校毕业之后，我于奥雅纳(Arup)的建筑小组(Arup Associates)工作了六年。1990年代初期开始在伦大执教获得了数项建筑设计的合约，“陈家毅建筑师事务所”(KAY NGEE TAN ARCHITECTS)便是在这情况底下在英国建筑师协会注册而设立起来的。KNTA创业之始至今快二十年，虽然其间不无起伏与人事的变动，但以“Originality”(原创性)为动力倒还一直坚持至今。

《设计家》：为何选择将事务所分设于新加坡、伦敦和伊斯坦布尔？在这三个地方的工作经验以及因此产生的观察，如何影响您的创作？平时，您如何安排自己在不同地方的工作？

陈家毅：事务所原先设立于伦敦，随后新加坡工作量增多了后便也在这里设点，成了亚洲区的据点。伊斯坦布尔是欧亚之间的一个城市，主要还是被它既传统又现代、既西洋又东方的魅力吸引着了。2003年，当我在伦敦认识多年的土耳其伙伴Bekir Kaya (他从事旅游与旅馆业)建议到伊城设点，我不经思索便同意了。许多看起来即兴的决定，其实潜伏在心里很久，设立伊城事务所便是如此；不知不觉也五年了，才渐渐明晓这城市的好处和来此的原因。譬如说它的经济这些年来飞速发展，却将老城墙老房子肆意拆掉，反而讲究如何将它们细心翻新，这一点便很值得我们学习。

往来三个事务所，时间倒没如何固定的限定，都看工作量而言。伦敦方面主要工作以老房子修建、室内工作、建筑竞图、初步设计概念为多；新加坡事务所则多参与新建工程与现场的实践，也许因为我们的工作毕竟主要在亚洲。即使在新加坡以外，飞行去监工巡场也比较方便——如香港、台北、甚至名古屋、杭州等。当设立伊斯坦布尔事务所Kaya on Coast时，我们决定在设计以外加多一项“产业开发”(Property Development)的部分，虽然都是小规模的事业，自行当起“业主”，尝试参与市场，尤其精致旅馆、饮食有关方面，带出某种“城市的魅力”，是我们一直想要着手的区域。

《设计家》：谈谈您主要的建筑思想。如果让您给自己的建筑生涯划分几个阶段，您如何划分？是否在不同的阶段，您有不同的建筑思想？这些思想形成的背景是什么？

陈家毅：当前需要发展的，是属于华人的现代建筑——如何将传统的建筑词汇与智慧，消化吸收之后，以新的方式、结构、材料、组合与构图带出属于现今的华人建筑。这一方面日本现代建筑经已做得非常透彻完美，这与如何提炼一个文化的精魂有关。

1990年代初执业时，我尝试了一系列的私人住宅设计，2000年初则参与了新加坡管理大学的设计工程，两者的要求条件与比例都大不相同；近五年来的所做作品延续了这两个阶段的一些想法和累积下来的经验——譬如说用材方面与细节的结构，都成为设计过程中思考的一部分。

在AA做研究，或伦大教学时经历过对自身建筑/建筑身份的探讨促使我至今对每一个工程都个别处理，从中寻找每一个设计方案的特有的个性——就像作者写小说或导演在拍一部电影，令得工程面貌不断换新多姿多彩，我们也藉此了解更多解决设计的方式，从而探索不同的管道、不同的可能性。

《设计家》：当下，您认为一个好建筑的标准是什么？回顾您的作品，哪些符合这些标准？

陈家毅：除了美观，一个好的建筑在设计上要有有所突破，更要塑造出一个舒适的环境，室内室外皆是。这便牵涉至对于景观、花草园林的部分，以及所在地的生态维持。建筑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

我想我们所做过的设计都朝着以上这些自我设定的标准去进

行，但是由于每一个项目的地理环境、要求条件不同，长出来的样子也大不相同，倒是一个父母教养长大的兄弟姐妹，难说好与坏。

《设计家》：您的许多设计都带有亚洲文化色彩，这是您的方向吗？您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国家的建筑设计如何保持地域性？

陈家毅：也许在英国久住了二十多年，重返亚洲先是讶异其快速的改变，其次是回想成长时接触过的种种过去，并又与我熟悉英国欧陆的情况比较，从中无疑获得一个新的平衡点。这平衡点倒不完全是“怀旧”，反而是在明白之后，往前看。

离开又重返亚洲，或许能将视角拉至一个比较客观，“旁观者清”的位置，学会了欣赏亚洲这地方原有的东西，综合了西方的思维，将传统翻新，或转变过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有些老风俗习惯，倒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和一定的美，我想若既得维护这些美好的传统、文化，又能拓展新事物，现代生活必因此而丰裕有趣多了。

《设计家》：您曾经说过，“如今的亚洲生活态度更具包容性。亚洲对于西方科技的成果，都能够尽量地配合利用；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坚持自身传统的保留与传承。”这段话，本身是否能够看作是对您自己创作姿态的一个概括？

陈家毅：毋庸置疑，西方的科技肯定比亚洲先进，即使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人们对许多事物的态度也比亚洲人开放，肯定有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但在设计上说，亚洲人的生活与文化有一定的个性不是西方人所能了解的，所以我讲过的那段话，便是回观东西方的一种真实感受。

《设计家》：请谈谈您近期的工作以及对未来的设想与期望。

陈家毅：我们事务所近期的工作除了住宅也着手于精致旅馆、公寓、博物馆等项目，比较多元化，也许和我的年龄与经验有关——过了半百才达到建筑师的黄金时期，哈哈！

我们目前在中国大陆、台湾、伊斯坦布尔都有工程项目，令我最感兴奋的是，这几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深厚，是我们创作灵感的源泉。亚洲人对设计的鉴赏能力在近几年提高了不少，业主给予建筑师创作的空间也益发自由辽阔，我对未来十年（尤其亚洲）充满了期望。

悦纳东西，探寻亚洲建筑与城市新思维

《设计家》：您同时在华文文化圈和西方文化体系里活动，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陈家毅：从小在一个中、英文相等重要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在中西文化间游走变得像呼吸一般自然；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一方面也常到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另一方面也到中、英语体系以外的日本和土耳其等，平日里与当地人的对话令我越发心生好奇，从而去发掘有关的历史与文化。

《设计家》：我们从资料里了解到，“您对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非常喜欢，也很有感触。这座城市发展的轨迹和它目前的城市文化生态，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地方？它们的哪些传统最具“亚洲”文化特质？

陈家毅：伊斯坦布尔位于亚洲的最尾端，或者也可以说是亚洲与欧陆联接最开始的一点，这地方很多东西跟我们很相似。首先，他们进入房子后会脱鞋，并且传统上爱坐在地上，这有点像过去的中国或日本；他们也爱吃米饭，当你越过伊斯坦布尔去到希腊或意大利，那里的人已经不太吃米饭了，而且希腊人或意大利人进屋肯定不脱鞋。伊斯坦布尔人洗澡的时候穿的鞋子，完全是我们的木屐。如此许多风俗习惯，甚至亲情观念跟亚洲国家非常接近。令我感触良多。

在1980年代，我曾经在意大利居留过一段时间，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与艺术，其间发现在丝绸之路繁盛的时期，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这两个发达城市之间不只是在商业上有很多交流，在文化上也有很多交流。比如说威尼斯现在著名的玻璃器皿制造法，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画里出现的地毯，都是从伊斯坦布尔流传过去的。而伊斯坦布尔本身也经历了许多朝代，从罗马、希腊到奥图曼时期，从天主教到伊斯兰教，无论历史和文化都非常的多姿多彩。所以初到那里我简直乐坏了，一下子像掉进了一个宝库，要取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关于亚洲的，一方面是关于欧陆的。

土耳其对文化和传统保留的方式，也令我非常感动。它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但并没有破坏天主教文化的遗迹，对罗马时期之前的古迹都保留得很好。最近，土耳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也许它还不如中国先进，但也不相上下。虽然经济飞涨，却并没有

因为钱财、暴利的缘故马上将城市改头换脸，兴建高楼大厦。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欧陆社会的个性，追求的是像意大利或者法国的城市发展方式，不会为了利益而把老房子拆掉，因而将自己的历史抹掉。

《设计家》：伊斯坦布尔，哪些建筑的设计让你难忘？这个城市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陈家毅：难忘的建筑实在太多。特别是在横断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很多老别墅到今天还是保留着的，建筑与海岸吻合，非常好看。在伊斯坦布尔，你随便去一个民谣的餐厅或酒吧，都非常热闹活跃。常常清晨3点、4点钟，还有人嘻哈走在街上。这个城市非常灵活、活泼、现代，这不是说一栋房子，而是整个城市带给你的感觉。上海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在亚洲，有许多事情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能够赚钱，但是在土耳其，许多事情的推动是因为人的兴趣所在。所以人的素质很重要，首先要好好保养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的东西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别人会不会来认同你、奖赏你，那是其次。

土耳其近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土耳其在电影上也很有成功，这完全不是偶然，这地方对这些事儿一直很关注，只不过外国人到最近才发现而已。

《设计家》：在新加坡，城市的历史脉络怎样得到保持？

陈家毅：新加坡在寻找平衡。基本上它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城市，面积很小，历史倒是很有趣。之前，新加坡曾经过英殖

民时期，经历二战洗礼。大概150年前，中国南部一带，如广东、福建人迁移过来，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祖先们聚居在某一个点，比如说某一区属于潮州人，某一区是福建人的，还有会馆，人们聚集在一起打麻将——就像张爱玲的《海上花》写的那样。华人居住的地方，建筑既受中国的影响，也受到英国和荷兰的影响。几十年、一百年过去了，这些房子还保留得很好。我们在新加坡的事务所就在一个保留区里，那条街不通车，有小石子路，紫荆花，从门、走廊到环境，都是南洋特有的风味和情调。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保留工作做得很好。

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曾经是华人聚居区的牛车水，原本是卖菜、卖瓜果的地方，为了讨好游客，政府把住民赶走，变成在卖一些很不起眼的纪念品。我觉得很可惜，重要的是保留街区原有的生命的跳动，你只保留一个硬件，软件没有了，就不同了。像在上海，如果你让我在新天地跟田子坊之间做一个选择，我当然选择田子坊。在那里，我拍照的时候能拍到有人在打牌，穿着短袖背心走动，非常地道。不单是本地人喜欢，外地人看了也觉得：这是老上海嘛！你干吗给我看那些爱尔兰的PUB，香港来的餐馆……这种东西，可免则免。我们要对自己的城市有自信心，一个城市的自信心很重要。

《设计家》：您曾应邀在中国做设计，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您对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何看法？

陈家毅：这几年中国真的进步了很多，而且现在很多相关负责人——做开发的人也好，负责杂志的人也好，因为有过到国外旅行和念书的经历，眼界不一样了。毕竟，不管做什么事情，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是眼界；一是气魄，一定要懂得怎样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这种不惧不怕的精神，中国有。接下来，肯定还有很多可观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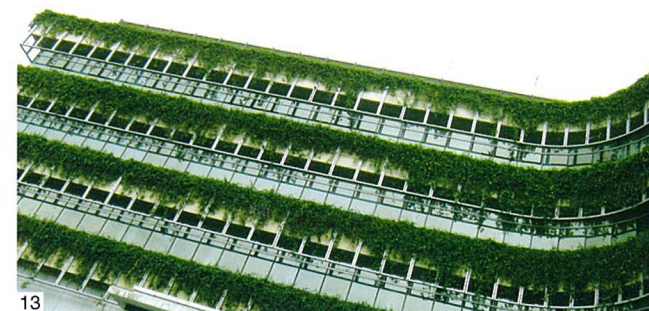
我唯一希望的是，现在中国富强起来了，应该对亚洲、或者对华人的设计起到更多的带动作用。像北京奥运会，很多知名建筑都是欧美人所设计，华人设计师或者说中国设计师怎么一栋房子都没有设计？也许这要一步一步来。比如我参与过的“长城脚下的公社”，开发者在十年前就认定了华人建筑师能够跟国际上其他建筑师平起平坐，这个肯定非常重要。接下来，在杭州的“亚洲的生活态度”，开发商的出发点是对的，让我们亚洲人，我们华人来做回自己的东西。这样下去，接下来的21世纪里，别人反而要来我们这里取经，说不定。

创作无分界限

《设计家》：您这些年做了许多“跨界”的工作，专栏作家、图书作者等，对于电影、城市文化等都有由衷的热爱和钻研，这些工作对您的设计事业和生活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家毅：我从来没有为我喜欢做的事情设立界限，或者把它们归属于某个部门。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对于中文还是很热爱。虽然很多时候阅读英文书籍，但我还是选择以中文来表达我的感想，写我观察到的东西，所以从中文转到英文，从英文转到中文，这个过程是无痕迹。而从建筑转到写作，从写作转到诸如舞台设计一类的事，对我来说则其实是很自然的“跨界”。

平时我也不一定看建筑物，我会比较喜欢看艺术装置、艺术



07-09 8 Cluny Park House, Singapore



10-13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14



15



16



17



18



19



20

14-16 2 Cluny Park House, Singapore

17-20 Asian View of Life Project, Hangzhou China

品、家具、电影，甚至舞台剧，所以我的灵感是取于各方面的。我想自己本身如已经具备能够做建筑的能力和技巧，很多时候寻求建筑的灵感，倒不是要找现成的建筑理论，而是要得到启发。从建筑来作为建筑的灵感，是一个“重复”的工作，我会尽量避免。

《设计家》：在您看来，关于城市文化的写作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家毅：我观察到，很多亚洲的城市策划人或规划者，都有点居高临下，而且受到二战之后城市规划的影响，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城市。但他们规划时忽略了一点，亚洲其实并不是崭新的城市。美国地广人稀，但像上海、台北、新加坡这样的城市，本身有自己的历史和条件，很多时候，居高临下的城市计划是行不通的。什么才是我们亚洲人的特色呢？一下子说不上来，所以我在城市观察和写作里，一点一滴去寻找这个属于我们的特色，特有的空间感。做任何城市计划，都要将城市本身的文化、习惯、风俗等习惯来融合进去，才能真正有特色。反观一些从日本或美国移植到中国的新项目，我不便多提，但你在上海、在北京都可以找到，虽然造型很新颖，但你不能说那是当地的特色，这个味道就少了一个层次。

对城市文化的观察，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该城市自己的特

性，而这特性真的是要慢慢摸索、过滤之后才能了解。《重观草莓地》与《城市磁场》这两本著作记录了我这些年来在外地人情与事物的观察，虽不终然与工作的项目有关，但从中无异启发了许多新想法。所设计的建筑物如何融入当地的社会背景，的确也是当今做跨地建筑师极重要的一环。

《设计家》：在您的文学作品中，不少灵感来自世俗文学，里面有对世俗生活细致的描摹，比如《游园惊梦》、《金瓶梅》、《红楼梦》，书中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是否也影响到您对建筑设计的态度？

陈家毅：与其说这些作品是世俗文学，我会认为这些作品，从张爱玲到《牡丹亭》、《红楼梦》，都是记载了华人文化的经典文学。去英国念书时我只带了两套书，一是张爱玲作品，一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适之的甲戌本。

有时设计是从文学获得灵感，但我尝试将它们化为现代的美学。把这些传统的東西用现代的眼光去看，比如张爱玲的《连环套》，我觉得一环套一环的概念很有趣，它们互相依赖，又是独立的个体。文学和建筑的关系，用英文来说就是A means to an End（达到目的之方法），把设计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到了那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展自己的设计。其实我觉得，用什么方式获得灵感都可以，比如一首流行歌曲也可以成为一个概念，完全因

人而异。只不过我喜欢看书，所以很多时候从书中得到灵感。

《设计家》：是否在设计中也曾向电影取法？这些灵感如何演变为真正的空间设计？

陈家毅：这一百年来，电影提供了不少具体的空间经验。我特别喜欢苏联电影、早期的法国电影，即1960年代的，还有近期伊朗的电影和土耳其的电影，因为它们不只在剪接或空间的处理带来很多超越我们自己本身实际的经验，也给人许多想象的空间。

最近我在做一个项目，是作家龙应台在台北阳明山住宅的内部装潢。因为主人是龙应台，除了她的孩子或朋友会来拜访，她通常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对着窗外怡人的景色写作。所以我将所有的墙面都敲掉，单用书架来作为空间间隔，基本上主人本身被书本围绕着。书本又与远山相呼应。主人卧室、客房、书房、客厅，门扇因此都成为书架设计的一部分。当没有客人的时候，门都消失在书架的背壁里头，主人可以在一个空间很顺畅地走到另外一个空间。但有人来拜访时，关上门，就形成一个个的隔间，有不同的隐蔽性。很多有意大利和法国宫廷生活的电影，都有这样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画面，给人掠过光和影的感觉。设计这个住宅的时候，我的确想到了电影里的感受，尤其是《去年在马伦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1961年）。我在伦敦教书的

时候，定它为学生必看的电影之一。

《设计家》：从您的文章和书，可以发现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而且您的生活内容也很丰富，您觉得自己的时间够用吗？这种状态对您的设计是否有影响？

陈家毅：当然时间是永远不够用的。不过我从小就很懂得乐在其中，也不会因为市面上出现什么，就一窝蜂去做。因为兴趣广泛，没法子我得善于利用时间，许多时候在飞机上，别人在看电影，我则写作，写自己的专栏。我常带着很多书本杂志去伊斯坦布尔工作。在那里，大概只有在我们餐厅可以找到台湾的《印刻》杂志。不是说刻意将它们带去餐厅，而是我看完了，把它们留下来，台湾游客看到都会惊喜。

我觉得，首先本身要喜欢这件事情，然后推广出去，别人也要喜欢。文学也好，建筑也好，事情都是这样四通八达的。我在伊斯坦布尔开“Çok Çok”（泰式料理餐厅），也是因为自己要吃辣的南洋菜，但因为喜欢，就尽量做到最好，这样别人来了尝过也觉得喜欢，这样就好了。正如设计与创作，如果从心出发，别人肯定都能感受到，如果苟且地讨好市场，别人也一眼就能看得出来。■